彭德怀挥师西北鏖战“马家军”（一）

西北地区位于中国东西部结合处，它疆域辽阔，包括当今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广大地区，且辖内多峰险林密的山区，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自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中国共产党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后，国共两党便在西北地区展开了殊死较量。其中彭德怀率领人民军队与以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为首的“马家军”之间的鏖战，尤为引人瞩目。

一

“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兴起于民国时期，活跃于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由于其首领皆马姓，便被称为“马家军”。“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年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其军事实力甚至足以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西北的中央军相抗衡，彭德怀后来就曾说过：“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

“马家军”先后依附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几乎参与了近代中国政坛的所有纷争。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不断地兼并和蚕食，其各股势力逐渐汇聚成最具实力的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个军阀集团，人称“西北三马”。马家军首领尤其是青宁“二马”（即“青海王”马步芳、“宁夏王”马鸿逵），崇尚武力，嗜血好杀，对当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等进步军事力量更是极端仇视。

1936年11月2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的国民政府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就曾仗着人马充足，武器精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扬言“我们马家军，要在一个月之内消灭河西走廊里所有红军”，对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进行疯狂“围剿”。英勇的红军西路军指战员们经过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再加上天寒地冻，没有坚实的根据地做依撑，补给严重缺乏，虽然经过月余的浴血奋战，歼灭了大量“马家军”，但终因粮尽弹绝，数万红军将士饮恨河西。马步芳用红军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红顶子，不久便由青海省代主席荣升为青海省主席。

自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后，如何防范盘踞于青、宁、甘地区数十年的“马家军”，以及陕北地区以胡宗南为首的数量庞大的新“西北军”系的侵扰，保卫“红色首府”延安的安宁，便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以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随后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之际，身处西北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是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胜负，视为决定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此，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便命令，由1纵和新编4旅、教导旅、警1旅、警3旅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军队对敌作战。中共中央基于当时西北战场的特殊形势，还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西北战场的军事策略。毛泽东同彭德怀也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彭德怀一针见血地说道：“西北的问题，我看主要对手是胡宗南和‘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而胡和马又有区别。”毛泽东赞成彭的意见，他指出：“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威胁。胡有野心，此人的后台是蒋介石；马有野性，是地头蛇，带点民族色彩，有很大的欺骗性。”就这样，统筹全局的“帅”——毛泽东，便与领军鏖战大西北的“将”——彭德怀，达成了共识。两人开始酝酿集中西北地区我军的主要力量，来消灭肆虐大西北的国民党“马家军”和胡宗南的新“西北军”系。

对于胡宗南，彭德怀并不陌生，他们可以说是老对手了。自十年内战开始，彭德怀就同胡宗南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较量，期间有战亦有和；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仗着蒋介石的恩宠，将其军事势力在中原、华北、东北及整个北中国地区进行渗透，渐成国民党军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他不断在解放区边缘制造摩擦，企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彭德怀率领陕北军民又对其进行了坚决的还击，使胡挑起战争的图谋一时难以得逞。真正使彭德怀忧心的，是肆虐大西北的“马家军”。“马家军”由于带有浓密的家族色彩，并且多为骑兵，我军战士又相对缺乏对骑兵的作战经验，因此，在彭德怀看来，能否战胜并歼灭“马家军”，便成为我军能否取得西北战场胜利的重要因素。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接连受挫的情况下，改对解放区重点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他战场。在陕北，包括“马家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25万余人，在胡宗南率领下，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了突然袭击。彭德怀率领下的西北野战军与“马家军”鏖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当时，围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中有胡宗南的20个旅17万多人，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12个旅近7万人，邓宝珊的两个旅1.2万多人。这些军队属于不同的派系，之间互有矛盾，虽然其进攻延安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心态却各有不同：胡宗南是蒋介石在西北重点培养的一颗棋子，是蒋的心腹爱将，其部是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在人员补给、物资供应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对攻取延安当然最积极；马步芳、马鸿逵反共、攻击延安是积极的，然其“马家军”虽英勇善战，盘踞一方数十年，但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当时又受制于胡宗南，与胡心有芥蒂；马鸿宾与嗜杀成性的马步芳、马鸿逵不同，且实力又逊于青宁“二马”，对进攻延安不甚积极；而邓宝珊则与中共关系甚密，且因其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对进攻延安更是敷衍了事。因此，真正威胁延安的，只有胡宗南和青宁“二马”。**（据银川党史网）**

红军西征宁夏13战

六盘山地区遭遇战斗。10月20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二军团到达六盘山南山脚下，遇敌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部队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一个骑兵团。经数次激战，击溃了敌人，掩护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于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海原地区遭遇战斗（又称何家堡反击战斗）。10月3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的海打战役部署，由于红军总部令红四、红三十一军撤离前总指定位置，致使红军主力右翼暴露，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红一军团一师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并肩作战，向敌反击，于海原以北之何家堡地区消灭敌两个团，俘敌1000余人，缴获马匹、枪支各1000余，残敌逃回海原。为了争取东北军，红军对所俘骑兵第六师的官兵以礼相待，经宣传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并归还缴获该师的马匹、武器。

萌城阻击战斗。11月12日，红军各部队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败退。除以第三十七军回头西渡黄河，准备进攻西路军外，令第一、三军向东猛追。14日，中央军委决定消灭第一军一部，以制止敌之追击。此战共毙伤敌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击落敌机一架。在这次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壮烈牺牲。

盐池、定边地区防御战斗。11月1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按照中央军委“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的指示，对各兵团集中地区和任务作了具体部署。16日，红军各部队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21日至22日，在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大捷的同时，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在盐池红井子击溃由红城水经惠安堡东进的胡部第一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战后，胡部第一军全线后撤，停止追击。

（据银川党史网）

革命夫妻夏麟阁与陈凤兰（上）

夏麟阁（1897年-1980年），山东郓城县人。陈凤兰（1906年-1962年），山东清州县人。夏麟阁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十几岁时，因为家乡年年闹灾，无法生存，只好跟着叔父逃荒到东北，在奉天火柴厂当童工，还曾在一家煤矿下井采煤。生活难以为继，夏麟阁只好参军，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冯玉祥指挥的一系列抗日战役，包括热河、多伦、包头、绥远战役，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1934年，他所在的部队在宁夏磴口县和平罗县驻防，后被马鸿逵收编。长期的军旅生涯，夏麟阁看透国民党军队的军阀作风，深感未来没有出路，愤而辞职离开了部队，在盐池县定居，以开豆腐坊为生。

1936年，红军西征的革命烈火烧到了盐池，红军的抗日主张深深地吸引了夏麟阁，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定能推翻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夏麟阁积极向党靠拢，成为一名红色政权的坚定拥护者。

当时灵武县和盐池县接壤，鉴于党地下工作的需要，三边地委需要派一名经验丰富、干练勇敢的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到灵武刺探敌情、搜集情报，在敌人内部开展统战工作。夏麟阁积极向中共党组织报名，主动要求到灵武工作。1942年，受中共三边地委的派遣，夏麟阁进入当时的敌占区灵武县开展地下工作。夏麟阁还有一位得力的帮手，就是他的妻子陈凤兰。陈凤兰做事非常干练利索，是一位热心革命的妇女，协助夏麟阁开展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革命工作。要开展革命工作，必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做掩护，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夏麟阁买下位于灵武县城东郊名为“福生协”当铺的几间屋子和园子，以开烟铺为掩护，为中共党组织筹备经费，收集情报，并用开烟铺赚到的钱采购布匹、药品等物资，利用采购货物的机会通过封锁线运送到边区。对搜集到的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夏麟阁及时向三边地委领导孙殿才、赵文宪汇报，成为潜伏敌营的优秀地下工作者。

灵武当地群众知道夏麟阁是做生意开烟铺的，即使烟铺多有陌生的面孔进进出出，也只以为是外地的“烟鬼”，并没有怀疑其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夏麟阁为人机智，灵活善变，加上和当时灵武驻军暂（编）九师的参谋长何晓霆、警察局局长王中立都是山东老乡，他们时常到烟铺做客，对夏麟阁多有照顾，对他在灵武地下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很多便利。1944年4月，三边地委指示夏麟阁设法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地下工作者李耀廷，他利用与何晓霆和王中立间的老乡关系，将李耀廷营救出狱，安全送回边区。

尽管夏麟阁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灵武军政要员的老乡关系，但身处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还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由于烟铺时常有不明身份的人进进出出，还常常运送一些紧俏的药品、布匹到陕北，国民党特务对他产生怀疑，认为他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初冬的一天，国民党十八师军法处一队宪兵砸开烟铺的大门，不由分说，将夏麟阁关押到灵武县政府内东侧的看守所。陈凤兰连忙拜托时任灵武县政府民政科科员的邻居白克勤到狱中看望夏麟阁，一方面看敌人有没有严刑拷问他，一方面看有没有对夏麟阁不利的口供。夏麟阁平时和灵武官商各界的关系处得不错，人缘好，监狱的警察并没太为难他，并未给他用刑。白克勤见到夏麟阁后，夏麟阁说：“你回去告诉你夏姨妈，我在里面很好，没有挨打，也没有逼供。人家说我是共产党的嫌疑犯，要我招供共产党员都是谁，藏在哪里，我一口咬定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和共产党来往过。他们没有打我，你回去让你夏姨妈放心。”

由于查不到实据，夏麟阁又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灵武被关押了十几天后，宪兵队又把他押送到吴忠看守所，对他多次进行提审，但夏麟阁的革命意志很坚决，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被关押40多天后，灵武当地的乡绅、铺保、知名人士联名保释，何晓霆、王中立也从中斡旋，十八师军法处宪兵队最终以查无实据的结论释放了夏麟阁。

经过这次严峻的革命考验，证明了夏麟阁的确是一名合格的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对党的忠诚并没有因此减弱，而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继续开展地下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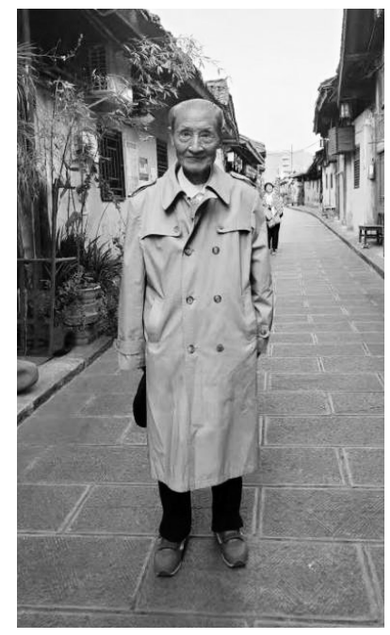
（据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七十二期 YI MIN SUI YUE

支援宁夏 无怨无悔（一）

——宁夏卫生学校上海支宁教师马洪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马洪达老人。

马洪达，男，1927年出生，祖籍上海市，1953年3月支援宁夏，到宁夏卫生学校从事检验学科教育，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马洪达老师个头较高、偏瘦，待人热情、思绪清楚、言谈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对马老师的采访很顺利，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94岁高龄还能顺畅地阅读英文报刊和诗选，流利的英语发音纯正，健康程度和思维的敏捷都超过同龄人，让人肃然起敬。

1927年，马洪达出生在上海长宁区一个贫困家庭，马洪达的父母共育有4个子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洪达不到10岁，八年抗战中上海全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日本投降后，上海又成为国民政府金融资本的大本营。从1945年到全国解放，上海始终是国共双方都紧盯着的工业和战略要地。马洪达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全在战乱中度过。解放前的上海没有现在这么大，他的出生地长宁区也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边缘，类似现在的城乡接合部。这里聚集着上海最多的工业企业，以荣家的纺织业、卢作浮的航运业，刚刚兴起的化工业、粮食加工业和酿酒企业居多，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领军之地。幼年的马洪达家境贫寒，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先后送几个孩子读了不收学费的公立学校，算是个文化人，初中毕业后马洪达还想继续上学，但战时的混乱、家境贫寒和日益飞涨的物价让他被迫告别学业，到一所乡村中学当起了老师，给学生讲代数和数学，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始终挣扎在前景不明的生活中。

马洪达：我上学的时候上海乱得很，日本人占领着上海，横行霸道，中国人见到了日本人都会远远地躲开，当时上海还有法租界、英租界等外国人特权的地方，一般的中国人根本不能靠近，所以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就对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十分痛恨，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中国人也能够堂堂正正地行走在大街上。但痛恨归痛恨，谁也无力解决。国力弱小、政府无能让当时的上海人吃尽了寄人篱下的苦头，当时的上海人不是我一个在挣扎着生活，而是所有人都这样，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百姓没有一点点的号召力，特别是临近解放时，上海的物价飞涨，百姓根本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所以上海解放后，老百姓对共产党特别的拥护。解放军占领上海时的一个举动，赢得了所有上海人的民心，解放军攻进上海时是夜里，进城后所有部队的官兵都静悄悄地睡在马路上，没有去打扰市民。这个影响太大了，在这以前，老百姓很害怕国民党的部队，他们不管到哪个地方，总是要向老百姓征粮征钱，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解放军的部队到了城里，没有敲响市民的家门，而是在下雨天睡在马路上，这样的军队百姓能不拥护吗？所以上海解放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老百姓拥护的不得了，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应该说，我们那代人坚定不移跟党走信念应该讲是从党领导下的解放军爱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的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形成的。我那时候刚刚20岁。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

三位军垦知青的支宁故事（三）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郭淑珍（右）在驾驶收割机。

郭淑珍：农建十三师二团(暖泉农场)北京知青，1947年12月生人，1965年10月从北京上山下乡到农建十三师二团七连。来到农场就赶上了挖沟劳动，郭淑珍的身板不是那么的硬朗，每天的挖沟劳动，她都是第一个完成任务，还去帮助其他知青；人工收割小麦的时候，她收割的速度，远远地走在其他知青的前面，创造了每天人工收割小麦的最高纪录。1966年农场从各个连队抽调知青，组建机务一连，郭淑珍因为工作积极，吃苦耐劳被选上，参加机务培训班，培训结束，在二连机务排开垦荒地，由于工作埋头苦干，没日没夜。作业后的田地，质量最优，多次被评为优秀拖拉机手，最后被提拔为农场二连副指导员，是暖泉农场最早被提拔的知青干部。1973年1月她与同是北京知青的农场七连副连长程思樵结婚。

1969年11月农建十三师改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农五师，二团改为了农五师三十三团，1973年同是在郭淑珍结婚的那一年，她被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农五师党委任命为三十三团党委委员、副团长。

郭淑珍担任团场级领导干部以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工作干劲更加饱满，生怕工作落在后边。1974年7月在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农场职工医院，医疗条件简陋，便与父母协商让帮助伺候月子，在即将临产之际，郭淑珍才请假回京，孩子还没有满月，便强忍着给孩子断奶，把孩子交给父母便回暖泉工作了。

直到儿子2岁多时，暖泉团场要去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搞玉米种子，才顺便将孩子带回宁夏。孩子刚来宁夏，水土不服老是有病，郭淑珍天天又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她的爱人只有每天中午用炼乳和米汤给儿子喂饭。丈夫无不心疼吃不上可口饭菜的儿子，埋怨为了工作而不顾家庭的妻子。郭淑珍曾语重心长地对自己的爱人说：“你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爱。”丈夫也就依了郭淑珍，只有最大限度支持她的工作。

1978年7月女儿出生的前几个月时间，郭淑珍挺着大肚子，坚守着工作岗位，领导多次关心地对她说，该回家休息了，不要伤了身子。郭淑珍说，这是第二胎，没有什么。为了不影响工作，郭淑珍坚决要求在宁夏生产，当时暖泉农场职工医院的医疗条件较差，怎么办？郭淑珍就动员说服自己的母亲，让母亲来到宁夏服侍自己，最后7月31日郭淑珍在银川农垦职工医院生产了女儿，月子期间母亲一直照看她和孩子。

丈夫程思樵戏谑地说：“有人说：我和郭淑珍结婚是如虎添翼，不知是我如虎添翼了，还是郭淑珍她如虎添翼了？”

有人比喻，郭淑珍是一个工作狂，像一个拼命三郎的男人，要不怎么一位领导听说郭淑珍副场长要生育小孩的消息以后，开玩笑地说道：“郭淑珍，你生什么孩子啊。”把郭淑珍视同为了一个男人。

男人就应该是一个铮铮铁骨，一个拼命三郎，一个爱场如家的汉子。郭淑珍就是这样一个“汉子”，难怪农场人，形容郭淑珍怎么会生孩子呢，一个女人，在大家的眼里，就是一个汉子，这个“汉子”带有赞誉的成分，带有钦佩的话语。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